



全球化、增长与贫困

建设一个
包容性的
世界经济



全球化、增长与贫困

建设一个包容性的世界经济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Globalization, Growth, and Poverty

Copyright © 2002 by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1818 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全球化、增长与贫困

©2002年,版权所有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This Wor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 in English as *Globalization, Growth, and Poverty*. This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is not an official World Bank translation. The World Bank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consequence of its interpretation or use.

本书原版由世界银行以英文出版,书名为《全球化、增长与贫困》。中文版并非世界银行的官方翻译。世界银行不保证翻译的准确性,也不对本书的解释或使用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

本书是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成果,其中的看法未必反映执行董事会或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观点。世界银行不保证本书数据准确无误,并对任何人引用其中的观点和数据引起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本书所附地图的疆界、颜色、名称和其他资料,并不表示世界银行的任何部门对任何地区的法律地位的看法,也不意味着对这些疆界的认可或接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增长与贫困/世界银行编写组主编.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2

ISBN 7-5005-6899-1

I . 全… II . 世… III . 经济一体化 - 影响 - 研究
IV . 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805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cn>

E-mail: cfeph @ dr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发行处电话:8819040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6 开 8.5 印张 176 000 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ISBN 7-5005-6899-1/F·6031

图字:01-2004-0757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报告小组

这份报告是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 Nicholas Stern 先生的主持下完成的。撰写人包括 Paul Collier 和 David Dollar。本报告吸收、借鉴了两位作者以及以下人的最初研究成果：Xemina Clark, Richard Freeman, Mary Hallward – Driemeier, Christiane Kraus, Jean Lanjouw, Peter Lindert, Will Martin, Remco Oostendorp, Martin Rama, Sergio Schmukler, Zmarak Shalizi, John Sutton, Tony Venables, Jeff Williamson, Michael Woolcock 和 Pablo Zoido – Lobaton。他们的个人论文可以在我们的“全球化网站”（www.worldbank.org/research/global）上找到。对以下人员出色工作我们在此表示感谢：Polly Means 绘制了图表；Emily Khine 和 Audrey Kitson-Walters 对报告进行了加工处理；Andrew Phillips 做了编辑工作；Heather Waorley 和 Susan Graham 负责出版事务。我们还要感谢 Caroline Anstey, Alan Gelb, Ian Goldin, Guillermo Perry, Guy Pfeffermann, Josef Ritzen, Halsey Rogers 和 Roberto Zagha, 在起草的早期阶段，他们提供了有帮助性的意见。

这份“政策研究报告”中的各种判断并不反映世界银行董事会或者其所代表的政府的观点。

译 者：陈 伟、常志霄

总校译：王水林

翻译说明

2002年7月从作者手中得到新书已经一年多，今天此书中文版终于得以付印。

这是一本介绍全球化的书，重点是讨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影响。本书两位主笔都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Paul Collier 目前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David Dollar 是世界银行发展政策局局长、候任中国局局长（2004年7月上任）。数十年来，他们一直从事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分析，对全球化问题、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反贫困问题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发展政策有着独特的见解。相信本书的出版一定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全球化、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如果善加利用，全球化战略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利器。

本书的前言、概述、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由陈伟（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翻译，第二章、第三章由常志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翻译。陈伟对第二章、三章的译稿进行了初次校对。全书由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关于转轨国家问题的特别顾问王水林先生总校。在翻译过程中，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高世楫（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蒲宇飞（国家信息中心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安（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等同仁也对译文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由于本书内容涉及的领域较多，加之译者水平有限，如有错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恐怖主义对美国的“9·11”袭击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印度和其他 20 年前的贫困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贫困减少则是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而因特网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更便利的交通运输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一大景观。延长人类寿命的技术在不断发展，与此同时，艾滋病也在蔓延，这些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想用简单的一本书去说清楚全球化这么一个大问题实在是勉为其难，因此我们并不打算考察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在这本书里，我们研究的重点是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影响。世界人口中大约有 1/5 的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 1 美元，在如此富足的当今世界，这一生活水准让人难以接受。经济一体化是否有助于减少贫困，如何让这一过程变得更富有效率——这些才是我们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我们的研究获得了与目前全球化政策争论相关的三个主要发现。第一，拥有 30 亿人口的贫困国家已经打开了全球工业品和服务的市场。二十年以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大部分是初级产品；而现在工业品和服务已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成功的“一体化”总体上讲，是促进了贫困的减少。我们可以在中国的很多省、印度的很多邦以及孟加拉国、越南的很多郡找到这样的例子。在这些“新全球化国家”(new globalizer)里，贫困现象已经大规模减少：在上一世纪 90 年代，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减少了 1.2 亿。如果没有大范围的国内改革，其中涉及到政府部门、投资环境以及社会服务等许多领域，一体化将无法实施。但一体化也需要国际行动来提供外国的市场准入、技术和援助。

第二个研究发现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包容性以及各国内部的包容性问题。在过去的 20 年，最令人不安的一个全球趋势是很多国家（人口总数在 20 亿左右）日益陷于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危险之中。这些国家的收入不断下降，贫困不断上升，并且当前的贸易参与程度低于 20 年以前。极端的情况是其中的一些国家，例如阿富汗、民主刚果共和国，成为了失败国家。帮助这些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对全球关系重大。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希望借此有助于改善目前的状况，使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之中。这些措施既包括富裕国家的市场准入，也包括更多的和更有效管理的外国援助。

在一般情况下，在那些已经成功打开全球工业品市场的国家内部，一体化并没有引发收入更大程度的不平等。但在这些国家，存在着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受保护的行业中的企业主和工人可能由于经济自由化和竞争的日益加剧而遭受损失，然而，消费者和在新设企业找到工作的人将成为受益者队伍中的一部分。重要的是通过社会保险消除了受损的风险，

按照新兴全球化国家的经济获益水平，这些措施是可负担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标准化或同一化”。在很多国家进行的民意测验都显示了对经济一体化所导致的文化或制度同一化的担心。然而，充分地融入世界经济的不同社会仍存在着巨大差异。在最富有的国家中，日本、丹麦和美国在文化、制度、社会政策和社会不平等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在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中，如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墨西哥，以下一点同样是惊人的：它们采取了不同的一体化路线，在文化和制度方面依然保持着独特性。差异性的坚实程度可能超越了大众的一般想象。但是，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方面，一些最新发展推动了这些国家走向非合意的标准化。重要的是，全球贸易和投资协议应当尊重各国在一些领域的自主权，这些领域包括知识产权、文化产品、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政策和劳动标准。全球化并不要求同一化，多样性在国际协议中受到尊重是很重要的。现在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强制推行全球标准可能被富裕国家用作恢复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了贫困的减少，这种趋势不应被逆转。但是，世界经济可以更具包容性：全球市场的增长不应该继续将总人口 20 亿的一些国家排除在外。通过援助和贸易政策，富裕国家能够做更多的工作以帮助现在的边缘化国家走上一体化之路，新全球化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一体化是十分有效的。

Nicholas Stern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

首席经济学家

2001 年 12 月

目 录

前 言 xi

概 述 1

| | |
|----------------------|----|
| 全球化减少了贫困，但并非每个地区都是如此 | 2 |
| 改善一体化的国际结构 | 5 |
| 加强国内制度和政策 | 9 |
| 权力、文化和环境 | 10 |
| 行动议程 | 13 |

第一章 新兴全球化浪潮及其经济影响 17

| | |
|--------------|----|
| 以前的全球化浪潮及其逆转 | 18 |
| 新全球化浪潮 | 23 |

第二章 改善国际结构体系，促进全球一体化 39

| | |
|----------------|----|
| 贸易政策 | 40 |
| 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的政策 | 47 |
| 移民政策 | 54 |
| 政策建议小结 | 59 |

第三章 加强国内制度和政策 61

| | |
|---------------------|----|
| 开放经济存在更多的竞争和企业的新老交替 | 62 |
| 投资环境影响开放的收益 | 68 |
| 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影响着就业和工资 | 74 |
| 全球经济中的社会保障 | 80 |
| 政策建议小结 | 85 |

第四章 权力、文化和环境 87

| | |
|--------|----|
| 全球化与权力 | 87 |
| 全球化与文化 | 92 |

| | |
|--------|-----|
| 全球化与环境 | 93 |
| 政策建议小结 | 101 |

| | |
|-------------------|-----|
| 第五章 行动议程 | 103 |
| 对全球化的担心及其根据 | 104 |
| 建设一个包容性的世界经济：行动议程 | 109 |

| | |
|-------------|-----|
| 参考文献 | 113 |
|-------------|-----|

专栏

| | |
|--------------------------------|-----|
| 专栏 1.1 开放和增长：回归证据 | 28 |
| 专栏 2.1 调整药品知识产权以使贫困国家受益 | 45 |
| 专栏 4.1 全球化与恐怖主义 | 90 |
| 专栏 4.2 热带地区的木材贸易 | 97 |
| 专栏 4.3 利用贸易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并非最佳的可持续的方法 | 97 |
| 专栏 4.4 具有相关贸易条款的多边环境协议 | 99 |
| 专栏 4.5 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环境协议 | 100 |

图

| | |
|---|----|
| 图 1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 | 4 |
| 图 2 乌干达、印度、越南和中国与增长密切相关的贫困减少 | 5 |
| 图 3 世界贫困状况，1820—1998 年 | 6 |
| 图 4 未加权地区平均关税税率 | 7 |
| 图 5 按国家集团分类的工资增长率 | 10 |
| 图 6 1998 年七国经济人均 CO ₂ 排放量 | 12 |
| 图 1.1 三次全球化浪潮 | 17 |
| 图 1.2 世界范围的家庭不平等状况，1820—1910 年 | 19 |
| 图 1.3 世界范围的家庭不平等状况，1910—1950 年 | 20 |
| 图 1.4 OECD 国家的长期集中趋势 | 22 |
| 图 1.5 富裕国家的家庭不平等状况，1960—1980 年 | 22 |
| 图 1.6 发展中国家的家庭不平等状况，1960—1980 年 | 23 |
| 图 1.7 世界范围的家庭不平等状况，1960—1979 年 | 23 |
| 图 1.8 各类商品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的份额 | 24 |
| 图 1.9 部分国家的贸易/GDP 比例变化，1977—1997 年 | 26 |
| 图 1.10 平均进口关税的下降，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末期 | 27 |
| 图 1.11 更有效的法律规则带来的结果 | 27 |

| | |
|--|-----|
| 图 1.12 人均 GDP 的增长率：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 | 28 |
| 图 1.13 按流动形式区分的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流动，1979—1998 年 | 31 |
| 图 1.14 制造业中的小时劳动成本 | 33 |
| 图 1.15 工人汇款，1999 年 | 34 |
| 图 1.16 富裕国家的家庭不平等状况，1980—1995 年 | 35 |
| 图 1.17 全球化的发展中世界的家庭不平等状况，1975—1995 年 | 35 |
| 图 1.18 中国日益拉大的不平等差距反映了不断扩大的地区差异 | 36 |
| 图 1.19 世界范围的家庭不平等状况，1975—1999 年 | 37 |
| 图 2.1 未加权地区平均关税税率 | 40 |
| 图 2.2 世界贸易组织的地区一体化协议通告 | 48 |
| 图 2.3 资本账户限制 | 50 |
| 图 2.4 自由化暂时扩大了繁荣—萧条周期 | 51 |
| 图 2.5 按移出地划分的进入美国的移民，1820—1998 年 | 55 |
| 图 2.6 七国集团中发展中国家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1998 年 | 57 |
| 图 2.7 进入欧盟的非法移民，1993—1999 年 | 57 |
| 图 2.8 地区人口的年龄结构，2000—2015 年 | 58 |
| 图 3.1 FDI 占国内总投资的份额，1970—1997 年 | 63 |
| 图 3.2 进口作为约束力量的证据：智利的工业，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 | 65 |
| 图 3.3 各邦之间平均净固定投资率的差异 | 69 |
| 图 3.4 各地区外国银行所占资产份额 | 70 |
| 图 3.5 机器制造业的相对生产率 | 72 |
| 图 3.6 不同类型国家的工资增长 | 74 |
| 图 3.7 工资和贸易开放 | 75 |
| 图 3.8 转型经济体的教育回报 | 76 |
| 图 3.9 越南的童工使用和家庭消费水平 | 84 |
| 图 3.10 孟加拉国的“食品换教育”计划和童工使用 | 84 |
| 图 4.1 全球七大排放经济体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1998 年 | 101 |

地图

| | |
|---------------|----|
| 地图 1.1 GNP 密度 | 25 |
|---------------|----|

表

| | |
|-------------------------------------|----|
| 表 1.1 全球化程度较高与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 | 26 |
| 表 2.1 1995 年新“发展回合”改善市场准入每年所产生的潜在收益 | 42 |
| 表 3.1 对于失业人员的收入支持计划 | 81 |

概 述

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和经济日益一体化。一体化是以下一些因素作用的结果：下降的运输成本、更低的关税壁垒、观念的迅速传播、日益上升的资本流动以及不断增强的移民压力。一体化——或“全球化”——产生了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权力转换、文化趋同问题的担心。全球一体化已经成为减少贫困的强大力量，但它本可以更为有效。其中一些（并非所有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全球机遇和风险的变化已经超越了全球政策的调整步伐。我们提出了一个行动议程，目的是增强全球化的潜力，以便为贫困人口提供机遇，同时减少其所产生的风险。

从总体上讲，全球化减少了贫困，因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倾向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些增长通常会广泛扩散。由于低收入国家打开了通向世界工业品和服务的市场，穷人能够从辛劳繁重的贫困农业中摆脱出来，到城镇里从事更好的工作。除了这种结构性调整之外，一体化还逐步提高了每件工作的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同技术的劳动者——可以是农民、工厂工人或者药剂师——的生产率和收入都比较低，一体化缩小了这些差距。但富裕国家仍然对贫困国家的产品设置了很高的壁垒，限制了减少贫困的一体化。作为我们行动议程的一部分，贸易谈判的“发展回合”为贫困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提供了很大帮助。

在国家间以及各国内部，全球化既造就了一部分受益者，也使一部分人成为受损者。在国家之间，全球化现在的主要作用方向是减少不平等。大约 30 亿人生活在“新全球化”(new globalizing) 的发展中国家。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这一集团以平均 5% 的速度增长，而同一期间，富裕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 2%。在 1993—1998 年间，在新全球化国家中，极度贫困人口（每天的生活费用少于 1 美元）数下降了 1.2 亿。但是，许多贫困国家——人口总数在 20 亿左右——已经被抛离在全球化进程以外。这些国家日益走向世界经济的边缘，与之伴随的是不断下降的收入和持续增长的贫困。非常清楚的是，全球化并没有对这一大群人产生影响。其中，一部分国家的发展受到了不利地理条件的阻碍，例如，地处内陆并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其他一些国家则受到乏力的政策、制度和统治方式的阻碍；还有一些国家被内战所困扰。处理这些边缘化地区的问题是我们行动日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减少这些地区的贫困要求我们把以下措施结合起来：为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进行政策改革；为解决教育和健康问题提供发展援助；向条件更好的地区移民，包括一国范围内的移民和跨国移民。

尽管各国内部情况存在很大差异，但平均来看，全球化并没有影响不平等。新全球化国家的快速增长为推行帮助穷人的再分配政策提供了政治契机，因为高收入阶层不必为此遭受绝对损失。例如，为推动非农就业而特别设计的规划就能够帮助那些仍然在农村生活的人。

一些能够预期到的情况也会出现：除非被其他政策抵消，开放有可能加剧不平等问题，例如，在获得受教育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发展教育，特别是发展对穷人的教育，有助于实现平等、改善健康水平和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提高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动力。平均来看，在不同国家之间，全球化并没有加剧不平等问题，这一事实往往会掩盖另一现实：即在每个社会的内部都会有受益者和受损者。良好的社会保险政策可能是帮助人们在这种动态性更强的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最后，对全球化的大量关注是权力、文化和环境问题。全球化确实影响到权力转换，但这些转换并非总是对已经很强的国家有利。例如，中国和印度迅速转变为世界上的主要经济大国；日益激烈的竞争迫使公司削减价格—成本差价（*price mark-ups over cost*）；在新全球化国家，很多工资都迅速增长。政府保留了广泛的选择范围，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分配政策方面。由于全球化，打击恐怖主义和消除内战就需要全球范围的合作。全球化提出了文化方面的挑战：由于外来文化和外国人的进入，一国文化的多样性程度提高了。有时候，外来文化或者仅仅是纯经济变化，就会形成取代本土文化的威胁，社会可能从法律上寻求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全球增长还威胁到环境。针对一些污染问题，各地需要采取管制措施。政府也许会在一种所谓的“底线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攀比中竞相削弱相关的环境管制。但是，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关键领域，环保标准实际上是在上升。其他问题，例如全球气候变暖，需要全世界共同做出反应。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缺乏那样的能力。但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全球市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这会成为以改善环境和减少贫困为目标的全球集体行动的强大推动力。

全球化减少了贫困，但并非每个地区都是如此

1980年以来，史无前例的全球一体化出现了。在第一章中，我们把新的全球化浪潮与前两次浪潮进行了对比。我们分析其过程并说明它怎样影响贫困与公平。

现代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870—1914年。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和通过谈判削减壁垒为一些国家更有效地利用其富饶的土地提供了可能。商品、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大规模增加。出口占世界收入的比例几乎增长了一倍，达到8%左右。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外国资本是其收入总额的三倍多。人口流动甚至更加引人瞩目。主要来自于欠发达欧洲地区的6000万人移居到了北美和其他“新世界”（New World）。南美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从人口稠密的中国和印度流向了人口较为稀疏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菲律宾和越南。其规模同欧洲向美洲的人口流动相当。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总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接近世界人口总数的10%。

全球的人均收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是并没有快到足以抑制贫困人口数量上升的水平。在推动全球化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出现了集中趋势，这些主要是由移民造成的。但是，全球化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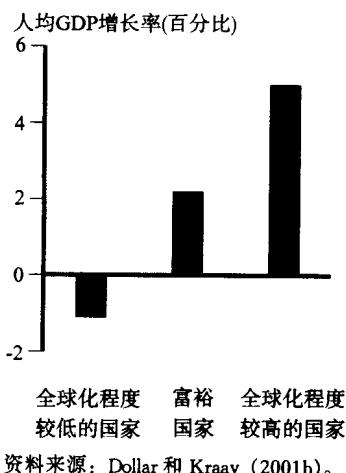
一个世纪以前，像今天一样，全球化看起来是一个必然趋势。但乏力的经济政策、失业和民族主义迫使政府实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期间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标志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出现巨大退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上个世纪 40 年代末，贸易与收入的比例几乎退回到了 1870 年的水平：贸易保护主义抹杀了运输业在 80 年的进步。在这一内向型的经济政策期间，全球增长率下降了：人均收入增长率降低了大约 1/3，贫困人口数量持续上升。世界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很明显，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推动平等化。尽管按收入标准衡量的贫困上升了，但这一期间人们的期望寿命也大大提高了，原因是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水平得到了改善。这说明贫困问题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其所有方面都可以由经济表现决定。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发生在 1950—1980 年，这一次浪潮集中于富裕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借助于关贸总协定（GATT），通过一系列多边贸易自由化措施，欧洲、北美、日本集中精力恢复了彼此的贸易联系。在第二次浪潮期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旧固守着初级产品出口，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隔离在资本流动之外。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归因于这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内向型政策。作为一个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随着一体化的深入，在 OECD 国家之间出现了集中的趋势：相对贫穷的工业化国家的增长速度最快。在社会福利政策和计划的支持下，大多数 OECD 国家内部出现了沿着更平等方向稳步发展的趋势。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也开始恢复了，但恢复的势头并不是那么强劲，所以，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尽管期望寿命仍在延长，贫困人口的数量却在持续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在一国内部，收入分配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最近的全球化浪潮大约从 1980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次浪潮是由以下因素激发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行业的技术进步；大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了改善投资环境，向外国开放贸易和投资。贫困国家第一次利用自己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潜力，打开了全球工业品和服务的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 1980 年不足 1/4 上升到 1998 年的 80% 以上。在这些国家中，巴西、中国、匈牙利和墨西哥几个国家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参与。大约 24 个国家——拥有 30 亿人口——在过去的 20 年中将贸易与收入的比率提高了一倍。在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区，贸易水平实际上低于 20 年以前。在那些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率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1% 增加到 70 年代的 3%、80 年代的 4% 和 90 年代的 5%。现在，这些国家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富裕国家：正如前一次浪潮在 OECD 国家之间所出现趋同变化一样，这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追赶发达国家，他们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图 1）。尽管新的全球化国家开始追赶，发展中世界的其余地区——大约有 20 亿人口——日益走向边缘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的增长率实际上是负的。

新全球化国家出现的加速增长和其他跨国统计分析是一致的，这些统计分析发现，贸易与更快的增长速度紧密相关。这些研究确立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更大规模的贸易与更快速的增长相关，在对其因果关系下结论的时候，必须仔细分析。Lindert 和 Williamson（2001b）认为：“对每项研究存在的疑问，妨碍了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所有证据。尽管没有任何一项研究可

图1 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



以确认，贸易开放无疑帮助了典型的第三世界经济，但是证据优势却支持了这一结论。”(pp. 29—30)。

一种广泛存在的疑虑是，日益上升的一体化正在导致各国内部不平等程度的提高。通常来讲，情况并非如此。在大多数迈向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家庭不平等只发生了较小变化，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这种不平等已经减轻了。但是，一些与上述情况相反的重要例子也存在。在拉丁美洲，由于以前在获得教育机会方面出现了极度不公平，全球一体化进一步拉大了工资收入的差别。在中国，不平等现象也出现了，但远没有形成难题。最初，中国并存的是极度平等和极度贫困。国内的自由化首先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快速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聚居区也出现了快速增长；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城市的快速增长使得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如果把中国出现的这种收入不均的扩大看作增长的代价的话，考虑到贫困大规模的减少，这种代价已经得到了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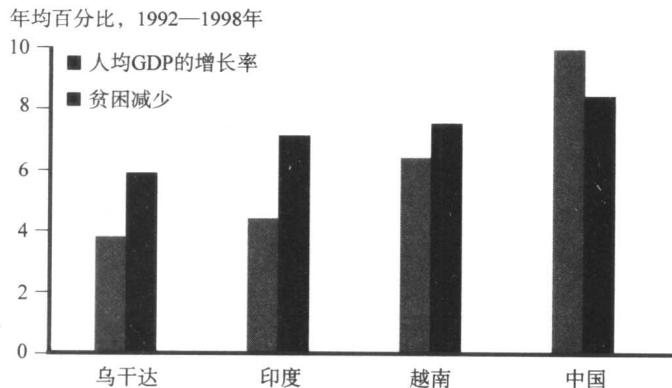
在这个国家，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已经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1999年仅有的3400万。

中国、印度、乌干达和越南发生的情况已经很好地例证了全球一体化的效能减少了贫困。随着越南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人均收入出现了大幅增长，同时，在收入不均方面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因此，穷人收入的迅猛上升，绝对贫困水平比10年前降低了一半。调查结果显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最贫困的家庭中就有98%改善了自身状况。这种福利改进不仅是收入问题，童工现象也减少了，学校的入学率也提高了。越南的出口直接为穷人提供了赚取收入的机会：出口产品中包括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如鞋类和大米，这些产品都是由收入水平最低的农民生产。

印度和乌干达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中，其贫困也迅速减少（图2）。尽管这些数据的某些方面是有争议的，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印度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的证据仍是强有力的。在20世纪90年代，乌干达的贫困人口下降了40%，学校的入学率提高了一倍。很明显，全球化能够成为减少贫困的强大动力。

大约20亿人生活在全球化参与程度不高的国家，其中很多人生活在非洲和前苏联地区。他们的出口主要被限制在初级产品的狭隘领域。出口产品如此集中，致使他们很容易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还有证据表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增加了内战的危险。因此，对这些国家而言，通过打开任何可能进入的全球工业品和服务市场以实现出口多元化是很重要的。三派观点对上述情形仍没有出现的原因提供了可信的解释。一派认为一些国家的边缘化是以下因素作用的结果：低效的政策、落后的基础设施、脆弱的制度和腐败的政府管理。其含义是一体化不仅仅要求贸易和投资开放，而且还要求在广泛的领域内采取补充性措施。第二派的观点认为边缘化国家为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所害。例如，内陆国家很容易发现，在全球性产品和服务市场上他们不可能具备同其他国家展开竞争的能力。这一观点的含义就是，为

图2 乌干达、印度、越南和中国与增长密切相关的贫困减少



注：1993—1999年印度贫困减少数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1d）；Dollar（2001）。

了帮助这些国家，我们需要制定全球计划——例如，消除疟疾和灌溉易干旱的农业区。第三派把第一派的分析同第二派的结论结合起来了。这一观点认为，作为低效政策的暂时性结果，一些国家已经永久性地错失了实现工业化的良机，因为大工业集团已经设立在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区。针对边缘化世界的不同部分，以上三个观点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但是，政策选择未必要限于三个观点之间。尽管确立全球联合需要解决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的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难题，成功的、谨慎的战略是将开放与必要的补充性措施结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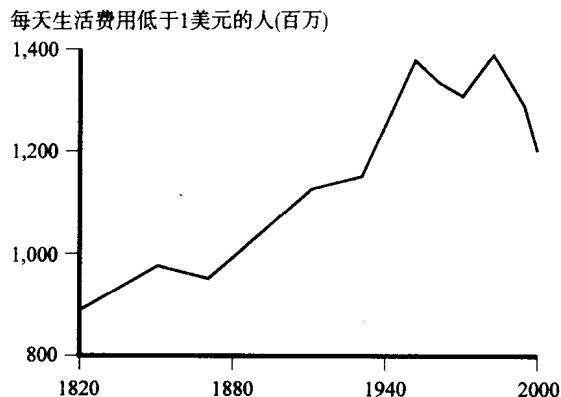
1980年以来，在全球化程度比较高和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差异，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总体表现失色不少。但1980年以来，总贫困人口数最终停止了增长，根据估计，这一数目实际下降了2亿（图3）。新全球化国家的贫困人口数的迅速下降，而在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区，贫困人口数仍在上升。贫困问题的非收入方面也在发生分化。在新全球化国家，期望寿命和学校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达到了富裕国家1960年左右的水平。在非洲和前苏联的部分地区，这两项指标都在下降。

1980年以来，世界的不平等状况并没有继续恶化，或许已经开始改善。对世界工业经济的参与提高了收入，但在此前的一个世纪中，只有少数人参与进去，因此，全球工业化在当时导致了更大程度的不平等。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也许标志着转折点的出现：参与已有效扩展，因为它既减少了贫困，也降低了不平等。

改善一体化的国际结构

第二章集中分析了贸易政策、金融结构体系和移民的全球议程。现在这轮全球化有一个

图3 世界贫困状况，1820—1998年



资料来源：Bourguignon 和 Morisson (2001); Chen 和 Ravallion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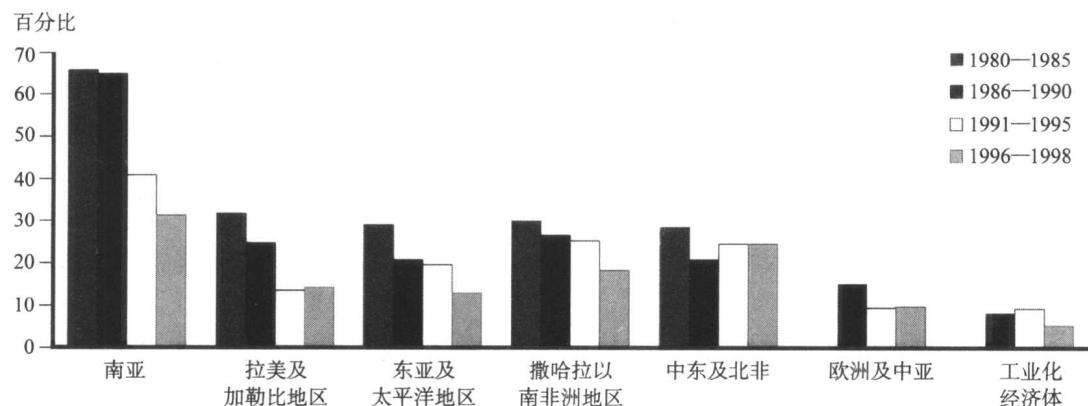
显著的特征：在过去的 20 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减少了进口限制。南亚地区平均关税的削减最引人注目，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 65% 下降到今天的大约 30%（图 4）。在拉丁美洲和东亚，这一期间的平均关税从 30% 降到了大约 10%。尽管个别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并且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总的来看，撒哈拉沙漠以南、中东和北非地区在自由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十分有限。这些地区的大多数行动是单方面的，而且并没有受惠于通过关贸总协定或者其后的世界贸易组织开展的多边谈判。一些国家，如中国、印度、墨西哥，开放了国门，他们的出口品已经调整为工业制成品，因此，它们正与富裕国家生产的许多产品展开面对面的竞争。1980 年，工业制成品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总额中只占 25%；到 1998 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 80% 以上。

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在经济上更大程度地开放，但它们还是要不断地与富裕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抗争。富裕国家的平均关税率是低的，但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设置了壁垒，这些领域包括农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每年，富裕国家的保护使发展中国家要支付 1000 亿美元的成本。考虑到现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比过去有了大幅度增加，还有就是发展中国家出口中 70% 的关税障碍来自于其他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进行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自由化将使很多国家获益匪浅。

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回合”应致力于改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市场准入。但是，这一发展回合受到了北方（the North）^① 狹隘的贸易保护主义利益的威胁。贸易保护主义者企图在贸易谈判议程中加入其他制度发展问题。如果富裕国家坚持推行在知

^① “北方”在此处指代发达国家，与此相对，“南方”指发展中国家——译者。

图4 未加权地区平均关税税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1c）。

识产权、劳动和健康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同一化，坚持将环境问题作为市场准入的先决条件，那么南北双方间的贸易增长前景将十分暗淡。本报告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正不断改善劳动条件，并加强环境政策，世界各方能够采取更多措施来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WTO进行的贸易制裁所带来的威胁是破坏性的，而不是支持性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发展中国家旨在改善劳动和环境状况的国内行动提供更大支持。

与贸易自由化并进，发展中国家已经减少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FDI）——猛增。私人资本流动带来了很多好处：增加了资本供应，提供了技术、管理和市场。一方面，涌向新全球化国家的私人资本急剧上升；而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经常出现资本外逃，到1990年为止，非洲40%的个人财产转移到了非洲大陆以外。并且，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也减少了。向那些至今未从全球化中大为获益的贫困地区提供更多、更有效管理的援助是必需的。

尽管削减贸易壁垒能够带来很多明显的益处，直接暴露于世界资本市场既意味着利益，也意味着很大的风险。要从国际金融一体化中获得大量的持久利益，一个国家需要很好的制度和政策。没有健康的国内金融体系，融入全球资本市场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出现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金融和会计服务领域的外国投资帮助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即使拥有最好的制度和政策，一国也可能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因为市场容易受到非理性的繁荣和萧条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在以下一些领域更有效开展国际合作是必需的：会计标准和透明度方面；通过保持充分的流动性对初发阶段的金融危机进行管理，良好的流动性确保一国在维持高效政策的同时，阻止和惩罚投资者开展高风险借贷业务。

移民是第三种全球流动形式。移民的作用与地理环境的重要性相联系。在制度低效和运输成本较高的地区，工资将会很低，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并不能使得这一地区的工资赶上